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

2012

文物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

2012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出版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丽
特邀编辑：王征
责任编辑：边漪
责任校对：赵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2012 /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3.10

ISBN 978 - 7 - 5010 - 3843 - 5

I . ①中… II . ①中… III . ①考古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 ①K8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1157 号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
2012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42.5 插页：1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843 - 5 定价：248.00 元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宿 白

主任：张忠培

副主任：王 巍 童明康 赵 辉

编 委：王 巍 乔 梁 孙新民 李 季 李水城

李伯谦 张忠培 陈 雍 陈星灿 赵 辉

郭大顺 徐光冀 袁家荣 曹锦炎 童明康

董 琦 焦南峰

主 编：王 巍

副 主 编：陈星灿

执行主编：朱乃诚

前　　言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词

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我们刚才在这个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的开幕式上，听到了单霁翔、孙士彬和童明康三位同志对本次年会的致词。本次年会所以能召开，是由于得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省文物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支持，以及河北省文物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所产生的结果。在此，我向这里提到的诸位同志和所有单位表达参与本次年会的同仁和中国考古学会的深切谢意。

在去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同志被邀请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中国考古学会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界的优良传统和中国考古学的新转变和发展的新方向，是他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很重要，故不仅将其刊登于《中国考古学会通讯》上，而且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上发表了。在第十四次年会之后的首次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上，我为单霁翔在近十年来对我国文物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所感动，故倡议常务理事会破例地推举单霁翔同志为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了我这一倡议。随后，单霁翔同志从国家文物局局长转任成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接着又被选为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长。也是有感于单霁翔同志的为人以及他在文物战线上以往的工作，我又不守以往惯例，特意邀请中国考古学会兄弟单位的中国文物学会的新任理事长单霁翔同志，出席我们本次年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刚才我听到了他的讲话，感到很亲切。为什么有很亲切的感动，是因为我站在考古学会立场曾将国家文物局局长岗位上的单霁翔视为自己的朋友，现在则将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长和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的单霁翔看成自己的兄弟。单霁翔同志身份的这一转变，说明他已成为中国考古文博界中的一位成员。我相信在座的诸位朋友，一定会认同我这一认识的。

中国考古学会本次学术年会的主要议题，是“环渤海考古”。这是一次承上谋求启下、继往追求开来的学术研讨会。苏秉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曾先后在山东长岛与淄博、辽宁大连、河北石家庄和天津等地主持召开过五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今天，中国考古学会召开的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第十五次年会，是苏秉琦先生主持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座谈会”的延续，也是中国考古学会对苏

秉琦理事长逝世 15 周年的纪念。

环渤海考古，是由“环渤海”和“考古”两个内涵结合成的一个概念。“环渤海”指的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考古”指的是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中观察到的环渤海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环渤海考古，是指依据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观察到的环渤海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环渤海考古是历时变异的动态过程，同时，处在同一时段的人们，对环渤海考古的认识，又因人而异。现在，我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概要地讲讲自己对环渤海考古最基础的一些看法，和在座的朋友们交换认识。

环渤海这一自然地理单元，涵盖山东北部、辽宁南部、河北东部和北京及天津这些行政区划。山东北部自东向西包括山东半岛及泰山以北的平原地带，是环渤海的南区；辽宁南部，包括辽东半岛、辽河平原及辽西山地，是环渤海的北区；包括北京及天津和河北省东部，主要为海河及其支流冲击而成的海河平原，是环渤海的西区。居住在面向海洋的环渤海地区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也如生活在其他中国土地上的我们的先辈那样，经历了曲折的历史道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与文明，至秦汉时期，终于融汇于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之中，使秦汉帝国成为与西方罗马并峙的屹立于亚洲东方的另一帝国。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来看，这是一极为复杂的过程，但在此仅能作以下概述。

(一) 环渤海地区是北京人、金牛山人和山顶洞人这类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居民的生息地区。公元前第 6000 年，在环渤海南区和北区，分别出现了后李文化和兴隆洼文化。这两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居民，生息繁衍，各自形成自具特色、时序演进、同一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这两支谱系考古学文化居民住居区，可各自被称之为“亲族考古学文化区”。这两大谱系文化均很可能直接溯源于旧石器时代，即是由旧石器时代某支文化转化成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这两个亲族考古学文化区各有其核心地域，彼此进行文化交流、竞逐、争夺，其态势与时俱变。同时，需指出的是，环渤海西区则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居民进行文化交流、竞逐、争夺，并为这些文化的居民先后占据的考古学文化的“历史—文化区”。

公元前 6000 年之时的环渤海北区，是兴隆洼文化兴盛时期，其居民占据了燕山以南地区，向西南的影响所及，则达磁山文化。至公元前 5000 年，以泰山为核心的环渤海南区这一谱系文化转化为后岗一期文化，并成了强势文化。这支文化向西发展，达到河套、汾河、伊洛、丹江乃至与丹江连接的汉水流域，而与半坡文化形成东西对峙；向北偏东地区扩张，则进入环渤海北区的部分地区，北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红山文化是由赵宝沟文化接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近三年来，我的这一认识发生了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指导张星德的硕士论文，将红山文化分为三期，现在可将其分别名之为后岗期红山文化、西阴期红山文化和半坡四期红山文化。就后岗期红山文化来看：一是这文化没有传承兴隆洼文化这一谱系文化的玉器；二

是从分析这文化的陶器的文化谱系结构可知，其主要成分属于后岗一期文化，基本上只有筒形平底罐和赵宝沟文化存在着某种关联；三是我近年来对魏家窝铺后岗期红山文化陶器制作工艺观察，发现其包括筒形平底罐在内的陶器制作工艺，均与赵宝沟文化泥圈套接制陶工艺不同，采用的是和后岗一期文化相同的泥条盘筑的制陶工艺。这里的筒形平底罐，先是以泥条盘筑成圜底筒形罐，然后在接近底部周沿贴上泥带，以扩大圜底上的外侧器沿，再在这圜底及其扩充的外侧器沿之下，贴上圆形泥饼，以成外底。这类筒形罐的外底，为平底，其内底形状不同于赵宝沟文化的同类器所习见的平底，而是后岗一期文化流行的圜底。所以后岗期红山文化的筒形罐与赵宝沟文化的筒形罐内外均为平底不同，是内为圜底，外为平底，故两者形似而神异。后岗期红山文化的筒形罐，也和这文化的其他陶器一样，是用后岗一期文化传统的制陶工艺制成的。随后，我又翻阅一些后岗期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其中有涉及制陶工艺者，也和我从魏家窝铺所观察得到的认识相同。四是如果将赵宝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和后岗期红山文化分别分期排序的话，据张星德告我：后岗期红山文化起始于赵宝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偏晚阶段，并且自此以后三者异地平行发展而各自有序；同时，后岗期红山文化早段的属后岗一期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可于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中找到其渊源；另外，除筒形平底罐外，自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以后的诸段后岗期红山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与同段的后岗一期文化的陶器极为相像。这说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演变，具有同步性。因此，我现在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即后岗期红山文化不是赵宝沟文化居民接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而是由后岗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移民接受了赵宝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当然是涉及东北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认识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设想，我现在将它提出来，供朋友们讨论。

历史进入公元前第四千纪，以华渭为核心地区这一文化谱系，从半坡文化演变为西阴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以超过其前身半坡文化态势向四邻扩张，其向东发展的一支，替代了后岗一期文化，占领了广大的华北平原，并随后在此演变成中贾璧和大司空文化这样的一类遗存。虽然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曾被名之为雪山二期文化的小河沿文化，进入到了北京，并沿着后来的长城地带，将其领域扩展到了张家口地区，并和大司空文化形成东北、西南对峙，可是到了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即龙山时代，晋中兴起的杏花文化沿着桑干河—永定河进入北京，这便是以往被称之为的雪山二期文化。可见，自公元前第四千纪起，环渤海已经不全是环渤海原居民的环渤海了，以华渭为核心地区的那一文化谱系的外来人，已进入环渤海地区，参与开发，在此生活、竞逐和争夺。除此之外，我还想就环渤海地区这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指出如下两点：一是在我成稿于1997年4月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一文中，已指出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自其花厅期开始，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但目前尚不能说明半坡四期红山文化和花厅期大汶口文化所处文明制度呈何种特征。同时，我们

也可以认为其后繁衍出来的诸考古学文化，均处于文明社会阶段，还可认为龙山文化推进了文明的发展，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先辈是亦农亦牧的文明社会的居民。二是我在此指出的在华北平原不是后岗一期文化吸收西阴文化因素实行文化的转化，而是西阴文化移民挤走了后岗一期文化居民，占据了华北平原，那么，西阴期红山文化“替代”后岗期红山文化实行的是否也是这样一种模式？还是如我指导张星德撰写的硕士论文所说的那样，是后岗期红山文化接受西来的西阴文化的影响而升华为西阴期红山文化？虽然我现在的观点仍然倾向于后者，但我认为要肯定这一认识仍需进一步求证。

除环渤海南区和北区的辽东半岛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当地生存的外，其他地区或不见龙山时代的遗存，或见到的是从外地入居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关于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及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生计，可以认为其南区和西区以及北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是经营以种植农业为主的经济，其北区和南区沿海及海岛上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渔猎、采集和海洋捕捞在其生业结构中则很可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先辈当是营亦农亦牧的经济。

（二）夏商时期的环渤海地区存在众多的考古学文化。至今的中国考古学对这些考古学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基本上仍停滞在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解析方面，对其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则少有涉及。即使文化谱系解析方面，有的明其源而不明其流，有的明其流而不明其源，有的源流还搞不清楚。我们应对现在的发现与研究，进行务实求真的梳理，明确问题，提出今后考古学工作与研究的方向。从环渤海地区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位置与贡献来看，一是环渤海地区夏商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比较其前身和其先前的考古学文化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文化水准，为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多于前人的贡献，但与其同时期夏（二里头文化），尤其是商（二里冈—小屯文化）这两个王朝的文化相比，均明显逊色。从基于文化实力的政治与军事态势来看，环渤海的夏王朝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均能占据一方，大致可与二里头文化抗衡的话，到了商王朝时期，则明显地趋于弱化；二是以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外的中国考古学文化相比，其文化发展水平，则不低于当时中国较先进的汾河流域，有的还高于汾河流域的夏时期文化，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当时的先进行列；三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孕育出来的先商文化，发达起来，对抗夏王朝，汤最终灭夏，建立商王朝，至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其版图东至黄河下游及大清河，西达渭水中游，北起河套，南抵长江，远远超过夏王朝的领土，其前所未见的文字所达到的成熟水平，应不是汉字的始创阶段，当是汉字奠基之作，其青铜工艺，达到中国青铜文化成熟阶段，创造的青铜文化为世界所有文明古国未能企及，其文化影响所至，尤其是其青铜工艺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诸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商王朝所创造的文明，将中国的王国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王国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的高峰。

（三）周王朝在环渤海地区，分封了齐、燕两个侯国。齐、燕两国分别经营环渤海

南区和环渤海西区。西周至战国晚期，即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之前的战国晚期上推至西周初期乃至夏时期的环渤海北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赵宾福在《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这一著作中，已经讲述得很清楚，我在此就不赘述了。朋友们要了解这方面情况，可以找这本著作看看。齐是太公吕尚的封国，都城为临淄，始初能管辖的范围很小，逐步发展，到西周晚期，甚至至齐成了五霸之首的春秋时期，才统领了环渤海南区；燕是召公奭的封国，都城在今天的北京。西周时期，燕的版图很小，经春秋和战国早中期逐渐壮大，终于在战国晚期扩大到了整个环渤海北区，发展成了战国七雄之一。周人灭商建立的周王朝，革除了夏、商王朝政权仅管理夏或商文化居民的政治体制，实行将周人及周人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纳入周王朝政权管理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实现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在同一政权管理下进行文化碰撞与交流，这较之夏、商王朝的政治体制，不仅极大地减少排他性殖民的驱赶与杀掠，又有利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实现文化及族群的交流与融合。齐、燕这两个周王朝的封国，自始就推行将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纳入同一政权管理的政治体制。在西周初期，齐与燕分别管理周人、商人和珠江文化的部分居民，和周人、商人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后裔（即塔照三期文化或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北燕文化）的部分居民。这两国内的不同考古学文化或族属的居民，经历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至西周晚期，和同时期的西周诸封国那样，形成了略带地域特色的、全国基本相同的，如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新质的周文化。这西周晚期形成的周文化，便是周礼形成的文化土壤，也是当时诸侯列国认同的主流文化，即区别夷狄的华夏文化。自此以后，除燕对东胡（很可能是“東胡”名号下的部分族群）那样的个别情况之外，齐燕两国仍继续推行容纳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的民族或文化政策，容纳居住在新扩张土地上的原居民，实行同一政权管理下的族属和文化碰撞、竞逐、交流与融合，推进了华夏族和这些土地上的原居民的文化或族群的交流和融合。西周王朝推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为进步到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产生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我们认为，西周王国是王国文明发展的第三阶段。至汉武帝时，这华夏文化才转变为更为一致的汉文化。公元前222年和前221年，燕国和齐国相继为秦所灭，原属燕、齐之地的环渤海地区从此纳入秦汉帝国的版图。

（四）综上所述，可见环渤海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一个发展过程。这里说的“文化多元一体”，指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这里讲的“国家一统多元”，说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这多元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自然也是一体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是形成“国家一统多元”的深厚基础，“国家一统”则是“文化多元一体”的必然归属。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讲的是“一体”内的

诸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所联结成的一体性，甚或文化的同一性，而就这多元一体内的各个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结构来说，则是一元为主的多元文化谱系结构，即多元谱系文化所结构成的“一体”文化，故多元一体内的诸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结构，也是多元一体的。这种文化谱系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杂种文化。杂种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文化杂交产生的杂种文化，则遵循文化“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文化的“多元”与“一体”，是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多元的各元是“个性”，“一体”则是这诸元文化的“共性”，亦即文化的一体性，甚或文化的同一性。我们说的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其中华夏或汉族等各族的文化也是“个性”，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即是华夏或汉族为主体组成的中华民族的诸族文化，这是包括华夏或汉族在内的诸族文化的“共性”，亦即诸族文化的一体性，甚或诸族文化的同一性。这“个性”和“共性”的文化，均呈一元为主的多元文化谱系结构，即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文化结合成的一体文化。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其一，这“个性”中也包含“共性”，“共性”中也含有“个性”；其二，这“个性”与“共性”的内涵及其量与质，均呈历史的动态变动；其三，国家或政权一统治下的诸族的文化“个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的消长，既取决于诸族的民族关系，也取决于国家推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则取决于后者。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和从先秦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以及至秦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来看，走过的道路虽曲折崎岖，但基本上还是顺畅地走了下来，日益光辉着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壮大了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这说明中国诸民族关系和国家推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好的。从文化多元一体的环渤海，到环渤海地区成为周王国及至发展为秦汉帝国之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成的部分历史，也是这部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成史的一个缩影。苏秉琦师说：环渤海是中国的国门。我认为只是到了秦汉帝国之时，环渤海才真正成为了中国的国门。

至秦汉帝国时期，我们探索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环渤海考古已宣告结束，同时，环渤海地区也就启开了在统一帝国内所处地位及其作用的历史新篇章。

以上讲的，是我对环渤海考古的一些新的主要的思考。当然，我希望这些思考能影响环渤海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乃至成为环渤海考古的主流认识。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学术见解能否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影响，甚至成为主流认识，归根结底在于它是否接近历史真实和把握了真理，而且，这还只能在学术自由争鸣中得到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将我对环渤海考古这些被自己视为的一些新的主要思考在这大会上讲出来的直接目的，归结为供同仁们参考，抛砖引玉，以促进学术的自由争鸣。

如何做好中国考古学会这样一个民间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的工作？要把中国考古学会办成什么样的学术团体的问题？我开始接任学会理事长一职之时，其认识仍处于朦

胧之中，一年之后，有些清楚了，至2010年的下半年，我明确地认识到应将中国考古学会办成这样的民间的群众性的学会团体：中国考古学会的组织建设要实现民主，学术研究要实现自由，学术争论要实现学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活动与学术会议要实现开放，概括起来，就是要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将中国考古学会办成考古界“自由人的联合体”。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我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的实践与主张，也希望成为办中国考古学会的方针。

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寻找环渤海考古的学术真理，达到目的的途径，只能是自由的研讨。研讨者，是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之谓也。既然是研究、讨论，就不能预定立场，也不能预设目的，让脑袋跟着屁股转，或让双脚决定思考的走向，而只能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我们的会议不能、更无权给任何人戴上“紧箍咒”，像唐僧治孙悟空那样。学术研究，既不能搞专政，实行思想或学术专制，也不能实行民主制。学术研究，容不了专制或专政，是因为专制或专政容不了学术研究。关于专政或专制之专横扼杀学术，我这一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经历过“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故有较完整、深刻的体验，即是我辈之后的后辈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这一道理浅显得不能再浅显了，也就无需再说了。那么，为什么学术研究不能搞民主呢？这是因为民主原则是多数决定制，毛泽东主席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事实也是如此。学术研究是求索真理，而求索出来的真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往往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到真理为多数人认知了，这真理就变成常识了。当然，常识往往也是真理，但这真理和新求索出来的真理是有区别的，两者当属不同的范畴。成为常识的真理，是常识性的真理，新探索出来的真理，乃是新真理，这新真理是不断更新的，故这新真理常常只为少数人掌握。这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本身的含义。因此，搞学术民主就会压制少数学者掌握的新真理，剥夺他们传播乃至坚持新真理的话语权。这一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故不能以民主制决断学术是非。我们应当尊重学者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实行学术与真理面前的不分性别、年龄和族群的人人平等，我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只能服务于会议的自由的学术讨论，尽职、尽量地为会议创造一个宽松的、自由的学术环境，供同仁以文会友、畅所欲言、齐放、争鸣。学术独立与自由万岁！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文化才能繁荣。

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为环渤海考古之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学术平台。

祝会议成功、学术进步，祝与会朋友们身体健康！谢谢！

为准备这个讲话，我先找赵宾福根据我的意见写就了一个发言稿。在讲话的前一天，即2012年11月22日晚上，参考这个发言稿，写成《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提纲。于2013年2月24日上午据这个发言提纲改成此稿。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 开幕式致辞

单霁翔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文物学会和故宫博物院，向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今天是 2012 年 11 月 22 日，整整一年前的此时此刻，即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在浙江嘉兴召开。令人不得不钦佩以考古学家为主体的中国考古学会，在时间安排方面的准确把握。一年前，我有幸应邀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参加了会议。今天，特别感谢张忠培理事长和大家再次给予我难得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最近，我在大家的帮助下，编著了一套《文化遗产·思行文丛》的书籍，使我有机会简要地回顾了一下过去 10 年的工作历程。过去的 10 年，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面临考验的 10 年。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文化遗产保护处于最危险、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过去的 10 年，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的 10 年。全国考古文博系统始终将文物法制建设、摸清文物家底、文物人才培养、文物安全保障，确定为重点抓好的四项基础工作，有人称为文物事业钉下了“四根桩”，为文化遗产事业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过去的 10 年，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理念进步的 10 年。凝聚全国考古文博系统的集体智慧，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工作规律，使机构不断得以充实、队伍不断得以壮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坚强力量，使考古遗址更加拥有尊严，使保护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在座的国家文物局以童明康副局长为首的同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们。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工作在发展变革的时代里，和大家一起参加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体味其中的甜酸苦辣，信心不断增加，视野不断拓展，思维不断开阔。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工作在团结和谐的集体中，全国考古文博系统就像一个大家庭，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事，都有心照不宣的伙伴，相互鼓励，拼搏进取。这一时期与同事们朝夕相处的难忘经历，至今经常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例如这一时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一次次国家重点工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联合行动，凝聚了全国考古文博系统的共同力量，保证了重点工

程顺利完成。“南海1号”沉船整体打捞、白鹤梁遗址水下博物馆建设，以及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设立，使我国迈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的行列。这一时期，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在四川汶川抗震救灾文物抢救保护工程中、在长城调查和保护工程中、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工作者始终站在前列，考古学者的视角更为广阔，拥有的材料更为丰富，新发现及其新发现带来的新成果层出不穷。这一时期，通过西安论坛、良渚论坛、洛阳论坛、荆州论坛等一次次大遗址保护论坛的举办，使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得到文物系统、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保护成果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今天以“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150处大遗址为支撑、覆盖全国的大遗址保护整体格局。这一时期，从高句丽遗址到殷墟遗址，再到元大都遗址，一次次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申报，推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行动，中国考古遗址保护成果，得到了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普遍赞同。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张忠培先生和各位专家。十年来，我有幸获得当面向各位考古学家请教的机会，直接感受、学习先生们的研究方法与工作作风。回想起十几次拜访张忠培先生时，先生总是把茶沏好，耐心地对我加以辅导，讲考古学的核心理念，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考古学家的文化追求，耳濡目染，受益良多。这些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高兴地看到，过去的一年，以张忠培先生为理事长的中国考古学会，作为我国考古学界最为重要的一个学术团体，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活跃于学术科研和考古工作的第一线，始终引领着中国考古学学科前进和发展的方向，积极引导广大考古工作者研讨当今考古学科和考古工作的前沿问题，为考古学科建设搭建起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示出特有的魅力。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孙士彬老师和河北省考古文博系统的同事们。十年来，整整30次到河北，每次总能看到孙士彬老师的身影，从山海关长城，到鸡鸣驿，再到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从南水北调考古工地，到大运河文物保护，再到第三次文物普查现场，孙士彬老师始终和考古文博人在一起，当“官”不像“官”，敢于为考古文博人撑腰，共同承担困难，共享成功的喜悦。

实际上，今天我是以两个今年获得的新的身份向中国考古学会表示祝贺。一是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二是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两个方面都与中国考古学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3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学会一路相伴同行，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共同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行动。今年5月7日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学会共同见证了湖南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开园，12月1日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学会将在安徽含山县共同主办“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合作，形成合力，努力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

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与综合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在世界范围考古学研究一直是综合博物馆的主要学科内容，例如故宫博物院在20世纪70年代曾根据自身的研究能力参加了龙泉东区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近年来，为完善学科建设、追踪学术发展方向，故宫博物院根据自身学术优势与藏品特点，有选择性地与各考古研究所合作参加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的专业化功能和社会化职能的发挥。一是2002~2004年，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通过参加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考古所联合进行的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得以深入了解御窑遗址的考古出土标本，从而更好地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御窑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在发掘工作中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的田野工作能力得以提高，并荣获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二等奖。二是2007年，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发掘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这是首次发掘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瓷窑址，出土资料可以填补该时间段瓷器生产的空白，并在故宫博物院举办考古成果汇报展。以考古新发现向社会展示原始青瓷的发展序列和最新研究成果，受到张忠培先生、耿宝昌先生、李伯谦先生等考古、陶瓷学界专家的好评。张忠培先生强调指出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并且把最新考古成果引入故宫“表明故宫博物院开始走出昔日皇宫的院墙，关注早期瓷器史的研究、关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追踪学术发展方向的决心，对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发展有较大的意义”。三是2010年与湖北省文物局签订协议，故宫博物院承担了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市庞湾琉璃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联合发掘，证实该窑址是明代为修建武当山宫殿专门兴建的官府琉璃窑场。窑址出土资料对研究明代官作琉璃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以及当时对琉璃建材生产场和原料的选取均具重要意义。

总之无论是中国文物学会，还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都离不开中国考古学会和各地考古文博单位的支持和指导。

最后预祝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成功举办。

目 录

前言

-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词 张忠培 (1)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式致辞 单霁翔 (8)

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王法岗 谢 飞 (1) 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初步研究

- 兼论与环渤海地区石器工业之间的关系 盛立双 王春雪 (12)
柿子滩与南庄头 田建文 (24)
环渤海背景下的辽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变迁 周向永 (36)
黄渤海两岸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关系 王永波 (48)
廊坊地区史前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刘化成 陈卓然 李明琴 (66)
西寨遗址再认识

——兼谈距今六七千年间燕山南北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张星德 (78) 燕山南麓筒形罐遗存初探 郭 明 (96) 小珠山下层文化新论

- 辽东半岛含之字纹陶器遗存的整合研究 赵宾福 刘 伟 杜战伟 (110)
辽东半岛公元前3000年前后考古学文化现象初探 王嗣洲 (129)
论双砣子一期文化 张翠敏 (135)
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 乔登云 (149)

二里头文化时期环渤海地区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 段天璟 (168) 冀中地区夏至早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徐海峰 (186) 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 张晓峰 (202) 商代祭祀中“殷庙”遗迹假说

- 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构件谈起 何艳杰 (211)

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初识	赵晓刚	(219)
略论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胡传耸	(232)
论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出现和扩展	韩金秋	(240)
泾河上游西周时期殷遗民墓葬研究	梁云	(256)
西周井(邢)氏族姓与渊流探析	庞小霞	(268)
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研究	王富强 闫旭东 刁鹏	(277)
燕文化探源	石磊	(290)
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	刘延常 徐倩倩 李凤琴	(300)
试探玉皇庙墓地所表述的社会上层	洪猛	(312)
燕下都与灵寿城异同比较及其成因试析	徐文英	(323)
论战国中山灵寿城的“市”	雷建红 陈伟	(334)
营丘考疑：昌乐营陵城新探	魏成敏	(338)
齐侯子仲姜鬲小考	曹锦炎	(349)
中国古代墓葬中夫妻葬位及尊卑	王会民 马冬青	(353)
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	郑绍宗	(364)
满城汉墓诸侯王纪年铭文新探	秦进才	(387)
京津冀地区两汉诸侯王墓随葬陶器和车马研究	相军	(396)
河北元氏龙正遗址与汉常山郡(国)考古	张童心 王斌	(403)
西汉麟趾金辨析	胡金华	(417)
汉代出土陶圆炉的发现与研究	魏曙光	(435)
北朝佛教寺院布局与佛殿等级研究二题	吴桂兵	(452)
考古学视野下的东亚早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以墓葬建筑艺术为例	王元林	(468)
国内城始建年代再探讨	王志刚	(478)
高句丽带扣研究	梁志龙 靳军	(494)
河北隆尧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称考略	郭济桥	(511)
试析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	姚乐音	(518)
我国北方瓷器出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以窑址为中心	王建保 张茂林	(523)
一组五代井陉窑陶瓷器的释读		
——盘龙冶押官妻李氏墓的瓷器、三彩器及墓志	刘成文 孟繁峰	(539)
洺州遗址官署建筑遗物及相关问题	胡强	(560)

金墓中所见“墓主人”图像释析.....	赵永军 (570)	
辽阳市明代城址调查与研究	刘 明 吴炎亮 陈 山 (581)	
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来自磁山遗址古代猪 遗存的信息		高建强 向 海 张有文 赵兴波 (595)
灵鼍史影：华北先秦鳄骨遗存解析		罗运兵 (603)
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		宋艳波 饶小艳 (616)
关于我国开展盐业考古的线索与启示		王 青 (626)
齐国制盐业探析		
——从昌邑盐业调查谈起		党 浩 (638)
关于北方系青铜器科学分析研究的几个问题		
..... 刘建宇 梅建军 陈坤龙 乔建军 马明志 邵安定 (647)		
编后记	(657)	